

程代熙文集

第3卷 ■ 海棠集

长征出版社

程代熙文集

第三卷

海 棠 集

长 征 出 版 社

目 次

记戴望舒同志二三事

- 往事与回忆 (1)

- 吊闻一多 (10)

国色天香花欲语 妙手丹青画似真

- 记丁云青同志和她的画 (14)

- 高尔基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22)

- 一则童话的启示 (26)

- 对作家要宽容 (29)

- 从“人学”谈到《寒夜》 (33)

- 谈电视连续剧《卡尔·马克思青年时代》 (44)

英国文学与英国电影

- 在一次学术讨会上的发言 (48)

- 罗丹和他的巴尔扎克塑像 (57)

- 谈谈中国文苑里的外国文学 (65)

- 阿·托尔斯泰谈文学语言 (75)

谈谈丹纳的《艺术哲学》

- 读书札记 (82)

从“奥韦尔热”想到的

- 读书札记 (86)

多余的开场白

- 写给《二十世纪外国诗选》 (95)

不能把人物和性格对立起来

——读书札记 (99)

创作自由和艺术规律 (106)

认真开展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 (108)

就当代文学问题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 (113)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的美学原理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120)

学习马克思主义 提高基础理论修养

——纪念马克思忌辰一百周年 (137)

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

——读书札记 (151)

艺术规律与艺术教条主义

——学习恩格斯对小说《旧人与新人》的评论 (193)

理论上的一次突破和创新

——学习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体会
..... (211)

马克思的《手稿》和美学问题 (236)

关于马克思《手稿》中一段文字的翻译问题

——答墨哲兰同志 (249)

米·里夫希茨和他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 (256)

从整体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

——读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 (272)

一本值得一读的美学论著

——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述评 (281)

恩格斯不能为我们文学中的公式化、概念化负责

——答徐俊西同志·····	(296)
致徐敬亚同志·····	(309)
也谈“典型”的历史变迁·····	(321)
拿来主义还是全盘照搬	
——谈怎样对待西方现代派文艺·····	(329)
再论异化问题·····	(341)
庸俗社会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读里夫希茨的《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	(366)
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真实观·····	(383)
正确对待西方现代派文艺	
——从《西方现代派文艺问题论争集》的出版谈起·····	(397)
漫谈《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二篇)·····	(402)
(一)《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的由来及其它·····	(402)
(二)歌德格言的特色·····	(412)
跋·····	(420)
文集跋·····	(425)

记戴望舒同志二三事

——往事与回忆

戴望舒同志只活了四十五岁，给我们留下了九十二首诗。倘就他从事诗创作的生涯——大约四分之一世纪——来说，数量的确不算多，而他的生平事迹留下来的则更其少。

我和望舒同志相识的时间很短，一共不到半年，还是在他生命之火熄灭前的半年。对于他的过去除了知道是一个鼎鼎大名的诗人之外，我可以说一无所知。

望舒同志大约是在四九年的二月末或三月初取道香港回到革命的政治中心北京（当时还叫北平）的。我也是经这条渠道北上的，不过时间比他要晚几个月。建国前夕，为了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成立了国际新闻局。我们就是在这里相识的。那时，我还是个才二十出头的青年。

在我的记忆中，国际新闻局有三个业务部门：一是新闻处，主管对外的英语广播；二是英文版《人民中国》编辑部；再就是编撰处，主要的工作是翻译出版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著述及有关对外宣传的文件等。望舒同志在法文组，我在英文组，大家同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工作。我

记得当时全处都在忙于翻译毛泽东同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望舒同志不仅精通法语，而且西班牙语的造诣也相当深。但他使用外文打字机的能力却不如我。有一天，他走到我办公桌跟前来，问我能不能为他打打手稿。我赶忙站起来说：“当然可以。”我们就是这样开始接近起来的。

我们编撰处的同志大部分都住在老莱街宿舍。那是一个小四合院，但北房却是两层楼房。望舒同志和他的老母亲住在底层，里外两间，一大一小，望舒同志住外间，老太太住里间，我们几个单身的青年就分住在楼上的两间屋子里，楼梯口紧贴着望舒同志的房门，所以我们常常在这里要打个照面。

有天下班后我回宿舍，正要上楼时，望舒同志要我到他房间里坐坐。那时大家的生活都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相当清苦。望舒同志的房子里除了一张木床、一只三屉桌和几只木凳之外，我记不得还有什么别的陈设。

平时，大家在办公室里都各人忙各人的工作，很少有工作以外的交谈。所以，尽管天天见面，但相互之间的了解实在不多。我坐下后，他问了问我的过去和家庭情况。那时我的老家重庆还没有解放。他这才知道我是独自一人不远万里辗转跑到北方来的。他当时身患严重的哮喘病，说话很吃力，很慢。我几次站起来告辞，想让他好好休息。可是他那长者的热忱还是把我留了下来。这次交谈大大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军攻占了香港，望舒同志未及撤离，被困在香港。之后不久，他就被日本宪兵抓进了监牢。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他才得以出狱。但是几年暗无天日的铁窗生活给他留下了十分痛苦的哮喘病。他最后就是被这个病魔夺去生命的。

麻黄素是那时治疗哮喘病的“王牌”药。我常常见他坐在床边自己给自己打针。他解释说学会这一手，也是逼出来的，总不能天天上医院去打针呀！除了打针外，在哮喘加剧呼吸困难时，他还须往嘴里喷药。尽管他的病是那样的严重，身子又是那样的虚弱，但我没有见他愁眉苦脸过。他不仅象一个健康的人一样的达观，而且也跟健康的人一样加班加点地工作。

记不得是在一九四九年底还是一九五〇年初，他住进了医院。我曾到协和去看过他一次。他说他的病好多了。果然，没有多久，他就出院了，又立即投入了十分紧张的翻译工作。

我青年时期很喜欢诗。我不仅翻译过惠特曼和俄国、苏联诗人的诗，而且我自己也写诗。我身边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不，应该说是一本诗册。我不光把自己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诗剪下来贴在本子上，还把许多未发表过，但我自认为有保留价值的诗工工整整地抄在上面。这个诗册既记录了我青年时期的理想和追求，当然，也记录了我思想上的幼稚与单纯。除了至亲好友，除了我所尊敬而又信得过的人以外，我决不将这个笔记本轻易示人。因为我深

恐招来别人的笑话。

有一次，我向他谈起我对诗的爱好，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他欣然同意了。于是，我呈上了我的诗册。

这以后有好些天，我们天天见面，天天打招呼，他还是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手稿交给我打字。我感觉到他的神情显得更亲切和随便了，但他却没有要找我谈诗的任何一点表示。我为此忐忑了好多天。

有天下班后，我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到外边转了一趟。当我返回宿舍正要抬腿上楼时，望舒同志从屋子里出来叫住了我。我知道他要谈我的诗了，心情不免紧张起来。我坐在凳子上，手脚不知放在哪里好，显得十分拘谨。他倒很随便，可越是这样随随便便，使我越是感到不安。

他先谈了一些别的，才从抽屉里拿出了我的那本诗册。他先夸奖我说，有些诗写得很不错，而且写得这样多，年纪又这样轻。接着还一连说了几个“不简单”，“不简单”。他在我的诗册里夹了一些纸条。他顺着纸条指着其中的一首说，这首诗就写得蛮好，写出了你对革命的追求和向往。接着他跟我谈起他作于一九四二年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并且还轻声地向我朗读了全诗。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好的诗篇之一。可是我在这之前还不知道他的这首诗。他说他就是从对革命的追求和向往，进而投身革命的。他的诗的后半段是这样写的：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象恋人的头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象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跟他这首诗一比，我为我那首《远方的星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诗题）感到脸上火辣辣的难受。

接着，他又指着本子上的一首《骆驼的铃声》问我，你到过沙漠吗？我老老实实承认，我不仅没有见到过沙漠，就连骆驼也是来北京后才见到的。那时，在北京城里，特别是沿城墙根一带的陋街小巷，常常可以见到一群群的骆驼，脖子上挂着一串铜铃，或是在街上缓缓行进，或是卧在街边休息。我只知道骆驼是沙漠里的所谓“行舟”，它不怕风沙，能耐干渴。这还是我从小学的课文上读到的对骆驼的描写。《骆驼的铃声》就是根据这一点常识写出来的。望舒同志说，写诗诚然离不开诗人的想象，但更不能没有诗人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否则，就一定失之于造作。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在思想上极大的震动，简直可以说是痛苦的震动。

他还说了一些别的，特别是肯定我的成绩一类的话。我记得他还鼓励我说，写下去吧，总会越写越好的，你多

年轻哟！

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恳谈。我一连好多天思索着、咀嚼着他的那些话。最后我终于认识到，我虽然已经写了三年多的诗，但我并不是一块写诗的料。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写过诗，有时甚至连翻译别人的诗，我都视为畏途。这不仅是我在那次谈话前未曾料到的，可以肯定地说，也不是望舒同志所期望于我的。

这次谈话，虽然使我失去了写诗的勇气，然而却使我懂得了真情实感的重要。

我的收获是很大的……

在机关火热的抗美援朝动员报名参军的大会上，老诗人向与会的全体同志朗读了他在香港日军监狱里作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更加感到了这首诗的分量。诗人不是在朗读他的诗，而是在向他所崇敬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宣誓，他要象所有的热血男儿一样，也要拿起武器并用自己的鲜血来保卫党刚刚缔造的新中国——“永恒的中国”。

《我用残损的手掌》作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而在这稍稍之前的四月二十七日，他还有一首《狱中题壁》，是《手掌》的姊妹篇。他在诗里敞开了他那宁死不屈的心怀：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的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
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在那生与死只有一线之隔的苦难日子里，望舒同志的唯一心愿是：“只有把敌人打倒”，“只有送敌人入殓”，“只有将敌人杀尽”！（《心愿》）。他始终坚信着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说：

让我在这里等待，
耐心地等待你们回来：
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
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诗人把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崇高的爱，和对民族敌人、反动派的深深仇恨、悲愤（《等待·二》）交溶在一起，铸成了他的赤子之心。

望舒同志早年虽然也写过一些伤时感怀、调子低沉的诗，但他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他终于赶上了时代的脚步，发出了诗人的宏声。如他在一九三九年元旦的《元日祝福》里说：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和解放。

望舒同志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这十年，是他一生的最后十年，也是他一生在思想上、创作上光辉灿烂的十年。这是戴望舒一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十年。在新文学史上，恰恰忽视了这十年的戴望舒。希望未来的新文学史的执笔者，给我们写出一个完整的戴望舒来！

望舒同志死得那样早，又是那样的快，实在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

一九五〇年三月初的一个上午，我们上班后不久，宿舍的工友急急忙忙跑到办公室来通知说，戴望舒同志去世了。我们都大吃一惊，于是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一阵急风似地跑回了宿舍。

那天上午，望舒同志突然感到喘不过气来，他下床来想去取放在靠门那张书桌上的喷药器。虽然其间不过才几步远的距离，但还未能走到桌边，就倒了下去。我走进房间时，他的遗体已经移到了床上，一条旧的黄军毯把他从头到脚盖了起来。他的老母亲守着他的遗体，痛不欲生地在一边长长啜泣。我们把老人扶进了里屋，不停地说些根本不能安慰老人的安慰她的话。之后，我们揭开盖着望舒同志头部的毛毯，肃立在他的身边，向这位爱党爱国的老诗人的遗容告别。

不多时，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郭沫若等几位领导同志也先后赶来了。记不清是哪位领导同志在看了看望舒同志这间简朴得不能再简朴的卧室后说，为什么不给他多添两把椅子呢？完全可以把他的照顾得好一点嘛！

望舒同志去世后不多久，同他离了婚的妻子就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那时不过六、七岁）从香港回到了北京。他的老母亲由组织上安排送回南方养息，他的“妻子”就进了国际新闻局。几十年过去了，我不曾听到过她们的任何消息。

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望舒同志辞世三十四周年的忌日，这篇小文就算作我对他的一点点纪念。我没有忘记他，也不会忘记他。现在可以告慰老诗人的是，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生机蓬勃，更加光彩照人了。

一九八四年元月二十二日夜
(原载《飞天》1984年第5期)

吊 闻 一 多

到昆明的第二天上午，虽然旅途的疲劳还不曾恢复过来，我们三人就相约去寻觅先烈闻一多的遗迹了。

同行中的张老，早年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又系闻先生的高足，他就成了我们的当然向导，尽管他跟昆明也已经有几个寒暑不相往来了。

闻一多先生牺牲的地方叫西仓坡，是当年西南联大教职员的一个宿舍区。闻先生一家就住在西仓坡二十号。

穿过翠湖公园就是西仓坡，这是随地势而起的一抹漫坡，一条很典型的南方山城小道。坡的下头，在紧靠马路边的地方，是一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从外表上看，既不象机关的办公楼，也不似一般的居民住宅。我想知道个究竟，就朝它走了过去。还未到跟前，就听到从门缝里挤出来的一阵阵孩子们愉快的嘻闹声。原来这是一所幼儿园。

在孩子们笑语声的催促下，我们沿坡而上。与西仓坡紧密相联的是府甬道。这一带的变化较大，张老在回忆中苦苦搜寻昔日西仓坡的景物，良久，他只好摇着头说，连

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听人讲，闻先生当年饮弹倒下的地方，已经不复可见了，因为那里现在成了一座仓库的所在地。不得已，我们就在一家工厂门前拍了一张照。当时有几个行人和附近的居民朝我们看了一眼，他们奇怪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既不是风景区，又不是什么名胜古迹的地方留影拍照。

意未足，我们又奔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把他的衣冠冢安放在“一二·一”四烈士墓前，是闻夫人的主意。闻先生生前是进步青年拥戴的良师益友，因此应该让他的衣冠冢同热血青年的遗骨连在一起。

衣冠冢座落在昆明师范学院的校园里（这里以前就是西南联大的校址），它已经和四烈士墓构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一座烈士陵园。陵园十分简朴，但四周绿树成荫。我们去时正值中午，阳光从万里晴空晒下来，落在白色的石壁上，使得整个陵园显得格外的肃穆和庄严。

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安置在烈士墓的中前方，墓碑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只一米来高。它的下面，是一块石刻的斜面，样子颇象一个匣盖，在它的上面端端正正地刻着一把石剑。

从这里我想起了他的诗集《剑匣》，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晨鸡惊耸地叫着，
我在蛋白的曙光里工作，
夜晚人们都睡去，我还作着工——”

这是他的自我写照。闻先生一生就是这样不知疲倦

地、夜以继日地在工作。他教书，他治学，他投身民主运动……一直到他的生命被国民党特务夺走为止，他都是在工作。

想到这里，我又感到某种不足，这个衣冠冢还缺少一点什么东西，……缺少一座一多先生的塑像。我希望昆明的雕塑家能把这个缺憾弥补起来，不光在衣冠冢，也在和西仓坡咫尺相望的翠湖公园给闻一多先生塑像。让后世的人们永远以他为榜样，为楷模。

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至个人，总得有一点精神。这可以是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也可以是闻一多先生的火山精神。一多先生早年以未爆发的火山自况，他在给臧克家的信里表示：他渴望能炸开那禁锢他的地壳，把光和热放射出来。在民族危难的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就象火山那样爆发了！——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先生是诗人，是学者，更是一个战士。有人说他集三者于一身。我只想说，一多先生作为诗人，他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作为学者，他是“杀蠹的芸香”；而作为战士，他用热血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其主流来讲，是革命的，进取的，也是敢于拼搏的。闻一多就是革命的、富于进取精神和勇